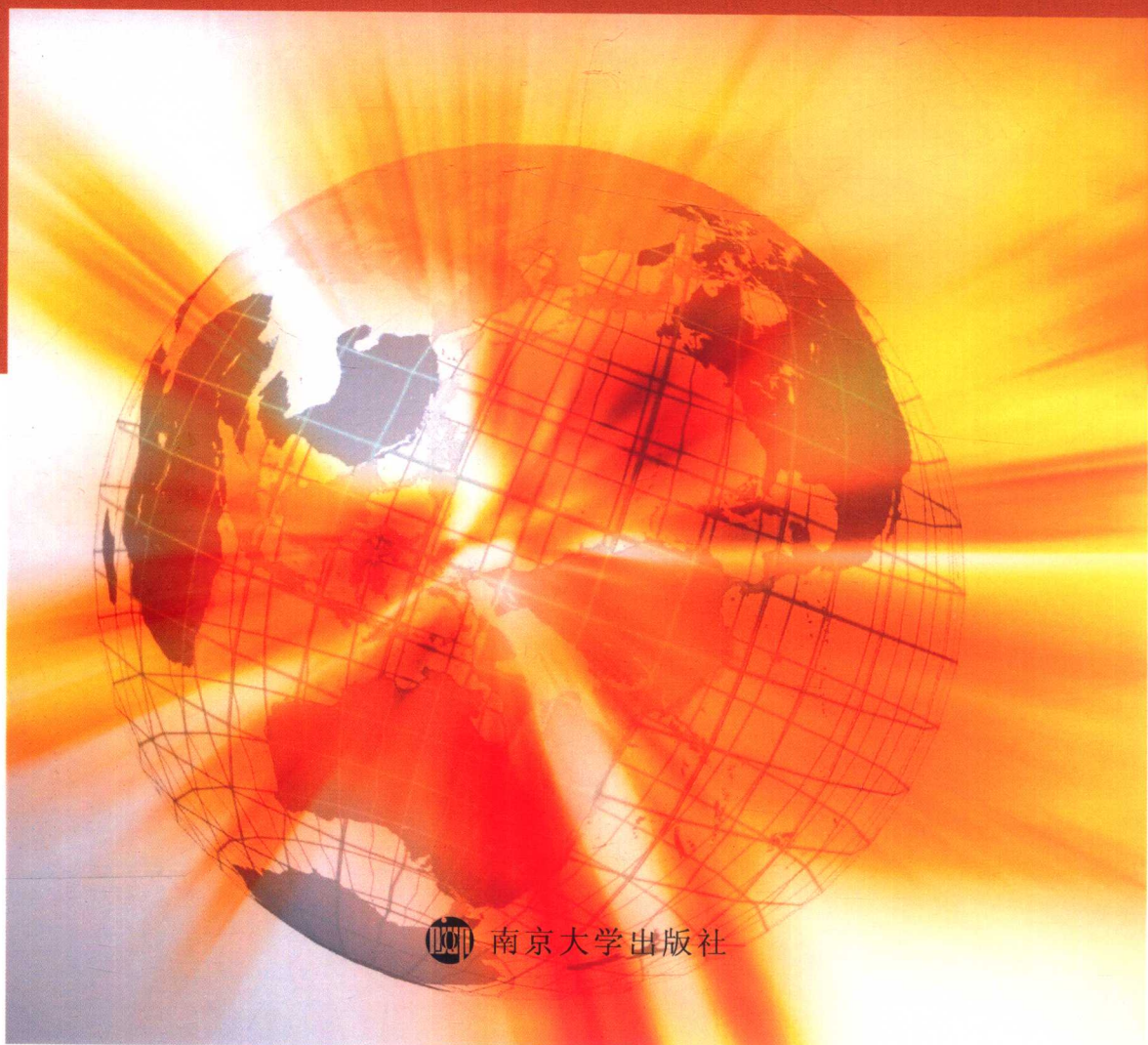



理性政治中的国家间 “互信”与“互惠”

——一项中美博弈热点的冷思考

姜 姝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受到2016年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专著出版资助项目“理性政治中的‘互信’与‘互惠’——一项中美博弈热点的冷思考”（编号：SKZZ2016009）资助。

理性政治中的国家间 “互信”与“互惠”

——一项中美博弈热点的冷思考

姜 姝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政治中的国家间“互信”与“互惠”：一项中美博弈
热点的冷思考 / 姜姝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3 (2017.5 重印)

ISBN 978 - 7 - 305 - 18258 - 7

I. ①理… II. ①姜…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217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 名 理性政治中的国家间“互信”与“互惠”——一项中美博弈热点的冷思考
著 者 姜 姝
责任编辑 李建国 武 坦 编辑热线 025 - 83597482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字数 312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8258 - 7
定 价 39.00 元

网 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njuyuexue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获得 2016 年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专著出版资助。
资助项目编号:SKZZ2016009。

内容简介:

理性政治能够为中美合作提供功能性诠释(functional explanation)。理性主义政治着眼于把影响重大事件的精神气质归结于基于理性生成的制度变量和结构变量,正是理性约束下的战略实践描绘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面对众多战略家颇为警示性的“中美战略互不信任”的谏语,面对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增长和结构性大国竞争的加深,面对中美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不俗地位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美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战略实践中需要运用理性政治的战略思维,摆脱“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作者简介:

姜姝,女,1988 年出生于江苏启东。2005—2014 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分别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已发表 C 刊论文 9 篇,专业期刊、报纸上的文章近 50 篇。现为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序

此番论述不是“片论”，而是较系统的论说——论说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中美合作问题，而其拟议中的主题是这类合作的必要和裨益。它将主要是一番依据自由主义合作理论（无论这类理论在其经典的和当代的形态上有怎样多种的形态）从事的分析性“提倡”。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战略安全和中美各自国内政治中的复杂的中美关系，面对两者——结构性相互依赖的增长与结构性大国竞争的加深——并存并进的中美关系，主要以“自由主义提倡”（liberalistic advocacy）为主题的论文不免显得简单甚而“浪漫”。它完全可以提倡，但同时必须回答关于总体背景下的现实性和可行性问题。

它不能不正视一系列基本的“作用中的”现实要素，例如中美在中东（特别是伊朗等问题）的利益歧异、立场差距和相关的某些政策对立；中美在海军建设、海权诉求和海军权势范围问题上总的来说愈演愈烈的矛盾；中美在能源新技术领域的富有贸易利益抵牾意义的竞争和“摩擦”；中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就其歧异而言的经济、外交和战略涵义；中美两国能源大公司及相关官僚机构在各自国内的集团利益、政治影响和政策效应；在中东、能源权势、太平洋海权等问题上两国国内各自的其他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舆论的重大影响；等等。比较令人信服的“自由主义提倡”不仅需证明合作必要和有益（鉴于有这么多自由主义合作理论，这是相当容易的〔何况凡理论皆是简约主义，而大凡自由主义理论皆多少轻视和贬低“杂七八拉的其他利益”，轻视和贬低有时甚而往往远比“理性”有力的政治/经济/社会“激情”〕），还必须论说它们颇可能成为政治主流——在各自有亿万人的内在多元的两国国内和更为（不祥地）能动的强国间国际政治中成为政治主流。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美国对华态势、中国对外关系和中美两国国内的民族心理及舆论状况下，“自由主义提倡” has much more burden of proof than it would have in some previous “better times.” 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初的情况与此多少类似。除了在略超过篇幅50%的意义上作相对简单的自由主义提倡，必须以其他篇幅严肃认真地谈论上述“捣乱”自由主义谈论的重大要素。只有经过这番谈论并大致证明自由主义提倡依然颇有实现的希望，这篇论说才是一篇较有说服力、也包含重要创新的作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务院参事 时殷弘

自序

研究中美关系,路径、方法和思想都是复杂的、重要的。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只需考虑到国际关系思想本身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属性,并由此呈现出一种能动易变的、错综复杂的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形形色色的“特殊主义”范畴之中,能源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范畴之一,正如声名显赫的国际关系学者基辛格博士所言:“如果你控制了能源,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中美能源关系演进的方向和趋势因此亦是重要的,它使得竞争与摩擦、合作与交流甚至博弈与输赢的进程形象化、具体化、生动化,并且永不止息。

理性有助于创建、维持和巩固“威斯特伐利亚模式”(westphalian model)下的政治和平。政治的理性要素和理性主义政治思想不仅形塑了一种活生生的战略文化,也在持续构建着一种历久弥新、常在常新的战略实践。理性主义战略文化,即政治的理性,包含着理性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信条和根本纲领。政治的理性(Rationalism)强调国际结构和国际秩序的构建,聚焦国际体系中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国际交往和国家互动,包含着国际社会“善治状态”的理性传统、政治思辨和哲理渊源。理性的政治(ration politics)则着眼于把影响重大事件的精神气质归结于基于理性生成的制度变量,正是理性约束下的战略实践描绘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幅图景是中美合作问题的缘起、凸显和终结。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当前国际和平和国际秩序建构的焦点,在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果说加强中美合作的倡议是为解决崛起国与霸权国暴力性权力转移的传统悲剧开一剂药方,那么中美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战略实践中如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在能源效率提高、清洁能源技术开发与转让、制定节能减排具体目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呈现出的形态各异的国际合作现象,则是其中大有裨益的一味良药。本书着力于理性主义政治思想在当代的实践,以中美能源合作这一当代现象为历史案例,对缓解“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小集团”(N-Group)和“谈判民主制”(negotiating democracy)等战略的制定和运用则主要代表了“理性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理性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两种版本合作战略的反思和运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都在不遗余力地为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而非意识形态性问题开出药方。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新的问题和现象层出不穷地涌现,伴随着政治过程中的许多“低烈度”议题发酵,比如生态、文明与相互依赖。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中美关系的发展依然要遵循许多感情、习惯和思想,甚至是许多这样类似的旧制度和旧习俗,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要充分理解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合作空间,就必须暂时忘记那些稍纵即逝的、短暂脆弱的现象议题,而须致力于考察深植于现象深处的、恒

久不变的国际关系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支配前提下实际采取的策略行动。

一方面,本书试图以理性主义政治思想为基础,将国际合作理论提升到更为严谨和新颖的层次,论证“理性结构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演化路径息息相关,并且区分政治博弈论中几类静态博弈图式的不同模式和主要内涵。为了更加符合现实状态,书中还进一步讨论了包含多人博弈和多次博弈的动态扩展博弈。当代社会科学中理论建构的两种最有效方法是理论建设的政治路径(political path)和经济路径(economic path)。政治路径强调国际体系,其影响不是通过一整套特定国际机制(mechanisms)、规范(norms)和价值观(values)使行为体政治化,就是通过对行为者施加各种约束来实现。经济路径则进行个体的理性、成本收益计算和利己主义假设,无论自身利益还是集体利益,都力图实现其最大化目标直至实现市场均衡。“理性结构主义”政治思想力图从中吸收这两类方法论所提供的见解,探讨形成国际关系变革的理论或概念。尤其近几十年经历了两极格局解体、能源危机和中东中亚的不稳定局势,世界权力的国际分配发生了深刻变动,新的社会合作力量正在脱颖而出,中美关系也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变革时期。

在中美能源关系的具体问题领域中,国际合作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能够持续下去吗?为回答这一紧迫问题,通过对中美各自能源战略和中美能源合作进程的政策梳理、现实基础和问题把握,指出美国担忧中国“能源执迷”(energy addiction)和“能源威胁”(energy threat)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美能源合作深度的本质原因。这种原因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思潮,即一国永远无法确信其他国家对它们不怀敌意。在国家意图不明的世界里,国家的安全需求在于防止任何国家的挑衅。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可能带来某些领域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当代这些事态的发展及其潜在风险,提出了涉及中美关系冲突与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在什么领域中中美关系可能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是怎样发生的?地缘政治、能源经济和技术革命在引起中美关系的变革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在经济和政治急剧变化的时期,究竟什么情况最容易诱发冲突和摩擦?我们是否有理由期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变革会比过去的变革更加“新型”,更加温和,更有希望吗?

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实践运用,既是论证,也是捍卫:美国关于中国能源的误判如何代表了狭隘的假定和封闭的心态,这些阻碍因素造就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复杂政治、在石油市场定价权利上的进退维谷、在东海油争状态下的战略猜疑、在清洁能源开发与转让上的保守傲慢和在承担气候变化责任义务方面的畏缩不前。中东地区正陷入一系列战争混乱,其实这些混乱的本质并不在于“民主”、“人权”等抽象的口号,也不在于某些错综复杂、利益交错的商业问题,说到底仍然是政治问题。中国的软实力策略正在带来成效,在部分获取商业性利益的同时,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艺术足以瓦解美国精心谋划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这些战略均衡循着美国视角中的现实主义路径,既包括在那些战略性石油资源要地和海洋通道获得相应的影响力,也包括在紧要相关的东北亚地区获得大致和平稳定的战略空间。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另一大关键领域——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正在发挥其独有的优势和作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将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汽车工业到全球变暖乃至未来世界经济的排名,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要新能源技术革命、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合作这个系统就能运转。

在中美合作战略中，“理性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政治思想注重探讨国际制度的功能和博弈均衡的诉求，包含如下诸类战略：加强构建中美信息沟通长效机制，完善中美能源合作机构建设；加强中美在能源磋商、石油定价等双边合作的力度，但仍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common and differentiate responsibilities)的原则；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明确中美能源气候合作的总体目标；坚持《公约》和《议定书》框架下的国际气候谈判和清洁能源合作机制，推进以谈判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在战略论证的过程中特意采用了理论多元化的路径。尽管严格的“理性制度主义”战略途径是一个有趣和强有力的出发点，但是，它本身的基础过于狭隘，以至于不能告诉我们在中美能源博弈条件下的诸多利益。为了达此目的，除了主要借用制度功能和效用论，还引入了地缘政治、全球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合作的见解，解释了这些因素如何在中美能源合作进程中起作用，以及如何回应来自国际体系的诸多压力。

很长时间以来，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各执一词和发展分化产生了背反的效果，掩盖了实践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中间立场。以构建世界和平、创造和谐共赢世界的理性主义政治思想一直力图打破这一分化，并且在中美能源合作的具体进程中得到了实践的存续。将经济推理和政治博弈的理性理解用于分析中美关系，在利益冲突时致力于寻找一种“完美的均衡状态”(perfect equilibrium)，既需要迫切被人珍视的现实主义的冷静精明，又需仰赖从理性主义的国际合作中汲取内在力量。

目 录

序	时殷弘	1
自序		1
第 1 章 理性政治的丰富“渊藪”		1
1.1 “显”“隐”之间的理性政治		1
1.1.1 理性主义的哲理溯源		2
1.1.2 理想主义及功能主义		4
1.1.3 制度合作论		4
1.1.4 博弈合作论		5
1.2 “理性的制度”和“理性的结构”		7
1.2.1 制度主义的互惠功能		8
1.2.2 结构主义的均衡功能		14
第 2 章 中美关系的演进脉络		24
2.1 战略竞争与战略互惠		24
2.2 从“兴—衰之辨”到“衰—兴之辨”		26
2.2.1 分享式治理遭遇背反		26
2.2.2 理性政治观的“魅化”		29
2.2.3 参照式治理有所作为		38
2.3 相互治理的理性诉求		50
2.3.1 理性主义政治观祛魅		50
2.3.2 “一带一路”的治理意义		52
第 3 章 能源关系的全景审视		54
3.1 能源议题的双重属性		54
3.2 能源合作的“再发现”		58
3.3 能源合作的战略框架		63
3.3.1 能源安全的多重解读		63
3.3.2 能源合作的政治遗产		65

第4章 国家中心与能源议题	69
4.1 中国:从政策导向到战略构建	69
4.1.1 企业先行	69
4.1.2 国家理由	71
4.1.3 从供给安全到使用安全	72
4.2 美国:“能源独立”战略	76
4.2.1 能源多元化	76
4.2.2 未来的阴影	81
4.2.3 奥巴马政府的“绿色能源”战略	82
4.3 现有合作机制的非对称性	85
4.4 小结	88
第5章 能源勘探与开发的安全要素	91
5.1 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因果机制	91
5.1.1 军贸的战略属性	92
5.1.2 西方学术界对军贸的理论解读	95
5.1.3 美国对中东的军贸战略	100
5.2 中美在中东的能源安全结构	104
5.2.1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106
5.2.2 石油市场价格机制	108
5.2.3 石油国家政治选择	110
5.3 竞争性的博弈结构	112
第6章 能源地缘政治的机制要素	115
6.1 东海问题的持续发酵	115
6.2 美国介入的战略设想	118
6.3 东海能源合作的前景分析	119
6.4 东海磋商与能源通道合作	121
6.5 中国海上能源通道中的美国因素	123
第7章 能源利用与消费的博弈要素	130
7.1 中美清洁能源合作	130
7.2 贸易保护主义阴霾	133
7.2.1 《公约》与捕鹿博弈	134
7.2.2 哥本哈根大会与性别战	136
7.2.3 低碳经济与盟主博弈	137

7.2.4 节能减排与囚徒困境·····	139
7.2.5 清洁能源技术开发与转让·····	140
7.2.6 《京都议定书》的进退·····	143
第8章 能源友好与气候合作 ·····	146
8.1 气候变化与气候政治·····	147
8.2 气候变化与制度构建·····	151
8.2.1 信息的自我实施战略·····	158
8.2.2 均势结构与气候合作·····	161
8.2.3 谈判民主制·····	163
8.2.4 欧盟的“气候行动”·····	167
8.3 中国的可信承诺·····	182
结语：“理性政治”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 ·····	185
参考文献 ·····	189
图表索引 ·····	199
后记 ·····	201

第1章 理性政治的丰富“渊藪”

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就像一座双子塔,伫立在政治关系的历史原野上。无论你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身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也无法否认“合作”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核武器和新科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带来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革,也促成了制约战争、构建普遍持久和平,甚至永久和平的创新性因素。虽然国际关系的冲突性质没有改变,但维持秩序、鼓励合作的因素已经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性主义导向。“理性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理性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是理性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能够有力描述当代中美关系的历史变化和诸多合作领域的兴衰起落,从而勾勒出优化中美合作问题的经验百态。

1.1 “显”“隐”之间的理性政治

在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发展脉络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众多而繁杂,需要对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图景进行一次较为合理的把握。必须了解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聚集的一大批研究成果,需要知晓包括非主流理论在内的其他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从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和发展中,一个明显的导向是十分突出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国家的互动属性和策略选择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

“国际合作”这一概念是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引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在其著作《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中,把国际合作定义为“行为体通过调整和完善自身行为,从而适应其他行为体预期或实际偏好的政策协调过程”,并提出了影响国际合作因素的基本假设:时间、重复博弈、数量、绝对收益和国际环境。^①自此以降,在国际合作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方学者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信息沟通与国际合作等经典命题提出了诸多颇有创见的论述。比如,英国学派布尔认为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地位,而历史上的近现代国际体系是冲突和合作的统一体,国际合作是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应有之义。类似跨国联合这样的国际合作应该在历史进程中占据首要地位,并积极地认识、把握并推动它以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

^① Karl Wolfgang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 M.I.T. Press, 1966, pp.11-13.

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因为由共同规则和规范构成的网络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因素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① 米勒(Milner)认为,国际合作研究涉及国家利益的界定、实践战略的可操作性以及一国实际履行协定的能力。因此,必须重视国家的官僚结构、利益集团和决策进程的参与分析。一国良好的政治体制也有利于实现国际合作,具有合法性、负责任、权力制衡机制和有充足透明度决策过程的政府有助于在相互交往中保证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②

如果我们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概念作一次系统地回顾和梳理,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片断”进行概念上的界定的讨论:

1.1.1 理性主义的哲理溯源

传统思想家首先提出了国际合作理论的基本价值观和理念体系,并且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提炼,逐渐成为国际合作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理性主义学派。从传统来看,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一些重要思想家已经提出了国际合作的发展理念,比如古希腊的荷马对国际和平意愿的追求、柏拉图提出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战争倾向的建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将自由意志和政治权力分散而列等。苏格拉底提出:“我们必须相信人类理性,同时又要提防教条主义;我们必须抛弃厌恶理论,也要抛弃制造智慧偶像的那些人所采取的神秘态度;科学的态度就是批评。”而伯里克利对希腊民主更多的是注重雅典城邦制度所包含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萌芽的贡献。斯多葛派强调“重视个人、理性和自然法。最高的立法者是自然本身,自然秩序也并非仅指现代科学所探究的物质的秩序。自然法概念是一种道德秩序,人类通过上帝赐予的理性能力与诸神一道,直接参与这种秩序。自然、人性和理性是一回事。它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既是个体主义的,也是世界主义的”。^③ 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世界秩序的保障。在罗马法时代,自由与法律之间已经不存在冲突,并且由于法律的一般性、确定性和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自由依赖于法律。而在中世纪,阿奎那的“天上之城”和“世上之城”表达了两个世界在神的意志中实现和谐,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以和谐为基础的。^④ 奥尔顿(William A. Orton)曾经这样评价希腊与理性主义的关系:“古希腊共和国曾

① Hedley Bull, *Hobb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y*, *Social Research*, Vol. 48, No. 4, Politics: The Work of Hans Morgenthau (WINTER 1981), pp. 717 - 718.

②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3(Apri,1992), pp.466 - 496.

③ Gilbert Murray, *The Stoic Philosophy* (1915), p.25. In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46).

④ 关于传统理性主义思想家的理念还散见于一些经典文献之中,如 Kirk, G.S. (1965). *Homer and the Epic: A Shortened Version of the Songs of Hom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90. Nails, Debra (2002). *The People of Plato: A Prosopography of Plato and Other Socratics*. Hackett Publishing. p247. Polybius; Frank W. Walbank, Ian Scott-Kilvert (1979).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Penguin Classics. Merriam-Webster, Inc (January 1995). "Ciceronian period". Merriam-Webster's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Thomas Aquina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5), p.39.

经鲜明突出地展示了自由与组织、稳定、进步和秩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过程既通过成功的经验,也经过失败的教训所获得,比如自由如何会蜕变成无政府,秩序如何被暴政所代替。在不断地反思过程中,西方根本的政治问题第一次被探讨,由此确立的种种理想和标准深深启迪了后人——”^①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际合作理论逐渐完善并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派别。首先开启近代影响力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指出这一合作思想不过是没有上帝的新教而已。韦伯指出,只有新教伦理才可能孕育出典型的现代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派别,一种理论主张,也被看作是实践一种思想的运动,以及由这一运动产生的,以理论为基础的制度。R·德沃金说:“从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就已经被概括和描述各种不同特色的政治立场,但在不同时代称作理性派的不同群体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相似性。”^②

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历时弥长的传统,它必须解决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的问题。在霍布斯看来,希腊罗马的自由学说讨论更多的是国家自由。这与后来贡斯当所作的“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精彩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Machiael Oakeshott 则说,“虽然学界很少将霍布斯冠之于自由主义者,但他的学说包含了更多的自由主义成分。追溯到欧洲政治哲学的三种传统,第一种包含理性和自然,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第二种是意志与人造物,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传统最杰出的代表;第三种是理性的意志,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其典型代表”。而列奥·施特劳斯则总结道:“霍布斯的学说是以自然权利,而不是自然法为起点的。这种自然权利是一种绝对合理的主观声称,是所有法律、秩序或义务的渊源,也不依赖于任何实现存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③而在杰斐逊看来,“在自然的自由状态中,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社会。激起他们产生这样想法的机缘会有千万种之多,一个人的力量与他的需求相差是如此悬殊,他的心灵又是这么不堪永久的寂寞,需要一种地心引力把刚到的移民组成社会,而彼此从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幸福就会确立起来”。^④有学者认为,“西方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理性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理性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理性主义原则。理性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而且在许多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理性主义可以定位成一种国家学说,其核心是关于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理论”。^⑤

① Truth and Authority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William A. Orton William D. Grampp Ethics 61(4):314-(1951).

② R.Dworkin, liberalism, In R.Dwokin: *A Matter of Princi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83. A.Ryan, Liberalism, in Goodin and Pettit, 1983, p.291.

③ Leo Strauss, “Relativism”, 13-26 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ed. Thomas L. Pang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

④ The complete Jefferson, assembled by Saul K. Padouer, Sloan & Pearle Inc, NY1943.

⑤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1.1.2 理想主义及功能主义

“一战”以后的二十年,威尔逊理想主义兴起,并且同时产生了建立国际联盟以实现国际有效合作的具体实践。威尔逊在《论国家》一书以及其他文章和讲演中,强调了国家间关系应该遵守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则,并在1918年的“十四点计划”中提出“公开外交、集体安全、民族自决、国际联邦、世界政府、裁军非战、贸易平等、公理正义”等等,其核心是民主、正义和法律。^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余年,理想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维持和平与国际合作是当时国际政治的主题。理想主义学派主张,人类的自然状态本质是和谐的,为了协调利益纷争,必须恢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和原则,鼓励国家的民主法治,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和平的普遍安全机构,重视国际法的作用,强调理性和国际合作,最终导向美好大同的世界秩序,维护普遍永久和平。^②

“二战”的爆发使得理想主义国际合作学说受到沉重打击,而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米特兰尼、哈斯的功能主义和卡尔·多伊奇的沟通交往理论都使得国际合作的理论构建保留了一小块“试验田”,在欧洲进行区域主义的试验,形成共同的区域意识、扩展相互交往的层次和采取统一的政策行为等,其核心是形成一套区域性制度安排,比如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欧洲中央银行等制度安排为欧洲一体化形成了强大的制度保障。^③哈斯将一体化定义为:“说服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的过程。”^④卡尔·多伊奇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一个过程,它使一部分人在某一领土内得到一种足够强烈的共同体感、制度感和实践感,从而使人形成一种长期可靠的和平变革预期。”^⑤

1.1.3 制度合作论

一直到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加深的20世纪70年代,国际合作理论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制度合作论就是其中强有力的一支派别。Peter Hall和Rosemary Taylor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⑥其中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影响力最为突出。所谓的国际制度(国际机制),鲁杰对此作了最早的定义:“已经被一部分国家所接受的一系列相互期望、规则 and 规定、计划、组织的能量和财政义务。”

① Blum, John Morton (1956).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rality*. Boston: Little, Brown.

② [英]约翰·格隆:《当代国际关系学:理论指南》,第38页。

③ Kristof, Nicholas D. “The Best Political Scientist in the World Goes on Half-Time, Still an Optimist”. *The Harvard Crimson*, May 23, 1979.

④ Ern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6.

⑤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5.

⑥ Peter Hall,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XL IV, No. 5, December 1996.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国际关系中国家为建立和平秩序而进行国际合作,其国际制度就是一种重要的维持和平手段,能够克服政治市场的失灵,调节国家之间的互动,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① 基欧汉以霸权稳定、合作和协作为基础发展了机制概念,其核心是霸权后的合作,也就是霸权国的权力和影响力衰落后的合作。霸权后的合作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共同利益可以导致机制的创立,还在于维持现有机制所需要的成本比创建它们要低。^② 1983年,克拉斯那主编的《国际机制》出版,他明确提出了国际机制是“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主体对某个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预期围绕它们而聚合起来”。^③ 从理性的利己主义模型出发,借助市场失灵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国际机制对于国际合作的独立作用和重大价值。克拉斯那认为,机制有自己的生命力,这种能力独立于最初导致它产生的基本要素。机制一旦创立,它本身就会改变起初创造实体的权力分配,并且能够增强或者减弱成员的实力。^④ 奥兰杨认为,国际机制由管理行为体活动的社会制度构成,这些行为体对某些具体活动抱有兴趣。机制的核心是一系列涉及了广泛内容的权利和规则,这些制度安排会给某些既定的行为体创造机会,其特定的内容会对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产生兴趣。^⑤ 在基欧汉等人开创的研究议程下,Michael B. Devereux、Kenneth A. Oye、Lisa Martin等学者进一步推进了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合作的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⑥

1.1.4 博弈合作论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原是一种古老的思维游戏,20世纪以来逐渐被用于政治和科学分析,在数学和经济学领域尤其受到重视。1928年数学家诺伊曼(John VonNeumann)首次创立“二人零和博弈”,后又于1944年与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开创了博弈论的经济分析模式。博弈论研究的一大突破发生在1950年,数学家约翰·纳什首次提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最优反应策略,博弈论开始从简单的零和游戏向非零和的国际合作转换。同时,数学家托克(A. W. Tucker)界定了“囚徒困境”下的合作博弈模式。1965年,数学家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又取得了博弈论界的一次革命,

①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58.

② [美]约翰·鲁杰:《对技术的国际反应:概念与趋势》,《国际组织》,第29卷,1975年。

③ [美]斯蒂芬·克拉斯那:《国际机制》,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

④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p.357.

⑤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Problems of Concept Formation*”, *World Politics*, April 1980.

⑥ 参见 Michael B. Devereux,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ecommitment, and Welfa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31, No. 2 (May, 1990), pp. 439 - 456. Kenneth A. Oye,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Lisa Martin, Beth Simmon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即开始引入动态扩展博弈并且界定了“精炼纳什均衡”。1967年,海萨尼(John C. Harsanyi)分析了博弈行为体面临的不完全信息困境,并讨论了在此情境下如何实现合作。从80年代开始,以博弈行为体的共同知识为起点,博弈论的学习理论和模仿功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随着政治进程的逐渐科学化,博弈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功能也逐渐显现,现实主义学者使用其分析模型来讨论国家间冲突的互动过程。1957年,卡普兰(Morton A. Kaplan)详细讨论了不同类型、不同假设的静态博弈图示,并将其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例分析。^①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则在其著作《冲突的战略》中巧妙运用了斗鸡博弈的基本图式,讨论了古巴导弹危机下美苏两大国如何进行避免冲突的策略选择。^②而面对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军事学家查马(Albert. M. Chammah)使用了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两大阵营的军备竞赛,由于对于对手意图的不确定性,博弈双方走不出囚徒困境,导致了恶性竞争,这对国际军控形势是相当不利的。^③

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议题的出现,博弈论的研究也更多地转向国际合作,其中自由主义的一大重要概念是“重复博弈”(folk theorem, tit for tat)。^④奥尔森研究了著名的“集体行动困境”,提出为解决个体理性带来集体损失的悖论,必须依靠N人博弈中的K团体。在大集团中划定小行动联盟,来实现公共利益的回归。奥伊认为,通过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由于害怕本轮的背叛行为会带来下一轮的不合作,博弈行为体会因此自我约束,在“未来的阴影”(shadow of future)下会更多地考虑到声誉和行为将会造成的后果。^⑤也有学者综合了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学科基础,指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都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国际机制进行缓解。通过影响行为者的预期,能够使得行为体更加关注先例,同时增加了报复手段施加的可能性。^⑥阿克赛尔罗德认为,一个成功的国际合作机制应该满足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结果,使得资源的配置具有经济效率,而具体的机制设置可以从时间、数目、分配、信息等动态博弈要素的策略分析来实现参与者的收益。^⑦ 诸方虽然立意各异,但是关于国际合作却有着共同观点,即重视非物质性的制度因

① [美]莫顿·卡普兰著,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0—249页。

②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172.

③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12页。

④ Duncan Snidal, *Formal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 263, note 15.

⑤ Kenneth A. Oye,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24.

⑥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4—119页。

⑦ Robert Axelor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 Baisc Books, 1984), p.52.